

肖高华著

曾国藩文化思想与
中国近代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肖高华 著

曾国藩文化思想与
中国近代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 / 肖高华著. —北京: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 - 7 - 5161 - 8742 - 5

I. ①曾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曾国藩(1811—1872)—
中华文化—思想评论 IV. ①K252. 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9870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孔继萍
责任校对 张依婧
责任印制 何 艳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5.25
插 页 2
字 数 250 千字
定 价 5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绪 论	(1)
第一章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渊源及其演变	(21)
第一节 曾国藩文化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	(21)
一 清末社会危机与文化危机	(21)
二 程朱理学道统的重建	(25)
三 “西学东渐”下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	(26)
第二节 曾国藩对理学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	(29)
一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萌芽	(29)
二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	(31)
三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	(40)
第三节 曾国藩对诸子百家思想的吸收	(46)
第四节 曾国藩对近代湖湘学派中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弘扬	(50)
一 近代湖湘学风中经世致用思想的再度兴起	(50)
二 近代湖湘学风中经世致用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	(54)
第五节 曾国藩对晚清经世派“变古师夷”思想的发扬	(58)
一 “变古师夷”思想的提出	(58)
二 曾国藩“师夷智”思想的形成	(66)
第二章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	(69)
第一节 曾国藩“笃信程朱”的理学思想	(69)
一 曾国藩的“性命并重、尽性知命”观	(69)
二 曾国藩的“格物穷理”观	(72)

2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

三 曾国藩的“立诚敬恕”观	(74)
第二节 曾国藩“兼容并蓄”的“百家”思想	(80)
一 曾国藩的“汉宋兼容”观	(80)
二 曾国藩的“取道佛法”观	(85)
第三节 曾国藩“务实求朴”的经世致用思想	(91)
一 曾国藩“经济在义理中”的思想	(91)
二 曾国藩的“以礼经世”思想	(92)
三 曾国藩“经史并蓄”的经世思想	(94)
第四节 曾国藩“中体西用”洋务教育思想	(97)
一 曾国藩的“中学为体”教育思想	(97)
二 曾国藩的“西学为用”教育思想	(98)
第五节 曾国藩“自强求富”的近代科技思想	(99)
一 曾国藩“自强求富”科技思想的形成	(99)
二 曾国藩“自强求富”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	(100)
三 曾国藩“自强求富”科技思想的意义	(101)
第三章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	(103)
第一节 “义理为体、经世为用”	(103)
第二节 “内圣修身为本、外王经世为用”	(106)
第三节 “宋学为体、汉学为用”	(109)
第四节 “儒学为体、百家为用”	(113)
第五节 “中国传统文化为体、西方近代文化为用”	(115)
第四章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洋务运动	(124)
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	(124)
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化思潮开始萌芽	(124)
二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开端提供了条件	(125)
三 早期中国近代化的特点	(129)
第二节 曾国藩文化思想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	(131)
一 洋务运动的兴起	(131)
二 曾国藩文化思想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	(134)

第五章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	(139)
第一节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政治近代化	(139)
一 曾国藩的“公心胜私欲”为官思想	(139)
二 曾国藩“任人唯才”的管理思想	(150)
三 曾国藩“重典救时”的“法治”思想	(156)
四 曾国藩的“制夷”与“和戎”外交思想	(161)
五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关系	(167)
第二节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经济近代化	(169)
一 曾国藩传统经济文化思想	(170)
二 曾国藩近代经济文化思想	(173)
三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关系	(175)
第三节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军事近代化	(176)
一 曾国藩传统军事文化思想	(177)
二 曾国藩近代军事文化思想	(182)
三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关系	(186)
第四节 曾国藩的文化思想与中国教育近代化	(188)
一 曾国藩传统教育文化思想	(189)
二 曾国藩“读书非官”的教育文化思想	(195)
三 曾国藩“师夷智”的近代教育文化思想	(197)
四 曾国藩“灵活多样”的教育方法	(199)
五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教育化的关系	(204)
第六章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影响	(207)
第一节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局限	(207)
一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	(207)
二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历史局限	(209)
第二节 曾国藩文化思想的历史影响	(212)
一 曾国藩“理学经世”思想的历史影响	(212)
二 曾国藩“商战”思想的历史影响	(218)
三 曾国藩外交思想的历史影响	(222)

4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	
四 曾国藩“中体西用”思想的历史影响	(225)
结 语	(228)
主要参考文献	(231)

绪 论

一 曾国藩之人生历程

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字伯函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（今双峰）人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思想家。曾国藩出生于清王朝由强盛转入衰落的历史时期，祖籍世代务农，传到他的上五世时已经颇有家业，但家世并不十分显赫。正如曾国藩后来所说，曾氏家世微薄，自明朝以来，没有以学业为生之人。

曾国藩六岁入私塾读书，取名子城。八岁时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开馆授业，曾国藩跟随父亲学习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史记》《文选》等。道光十年，曾麟书把曾国藩送往湖南衡阳，跟随汪觉庵学习。一年多时间后，曾国藩又返回湘乡连滨书院学习，得到山长刘象履的高度赏识。

道光十四年，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学习，师从当时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。当年与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的同学还有罗泽南、胡林翼、郭嵩焘、左宗棠、刘蓉、刘长佑等人，其后来大部分成为了湘军重要将领。道光十五年，曾国藩第一次入京参加会试，但是考试结果名落孙山。道光十八年，曾国藩第二次入北京参加会试，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，朝考一等，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从此以后，曾国藩置身词林，改名为国藩，意味着抱有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。随后，曾国藩与郭嵩焘等同行，回到湖南老家，酬谢亲友，祭拜祖坟。

道光二十年，翰林院举行散馆考试，曾国藩从湖南返回北京参加考试。这次考试的散馆题目为《正大光明殿赋》，以“执两用中怀永图”为韵，诗的题目为《赋得“人情以为田”》。在散馆考试中，曾国藩名列二等第十九名，被授职翰林院检讨，随后担任国史馆协修职务。道光二十三

年，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，廷试的题目为《如石投水赋》，其韵为“陈善闭邪谓之敬”。在这次廷试中，曾国藩列二等第一名，任职翰林院侍讲。不久之后，清廷任命曾国藩为四川省乡试正考官。

道光二十四年，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。次年，曾国藩先后担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、翰林院侍讲学士、文渊阁直阁事等职。道光二十六年，湖南籍京官上书皇帝奏稿，由曾国藩撰写，意味着他已经成为湘籍京官之首。道光二十七年，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，取得了二等第四名的优异成绩，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八股制艺考试，任职为内阁学士，同时兼礼部侍郎，次年升职为礼部右侍郎，开始了其真正的官场生涯。任礼部右侍郎之后，得到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赏识，四年之中，曾国藩先后担任过兵、工、刑、吏各部侍郎，最后升到二品大员。

在京官期间，曾国藩经常拜访理学师友。道光二十一年，曾国藩访问唐鉴，唐鉴告诫其“诗、文、词、曲，皆可不必用功，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，彼小技亦非所难”。在这个时期内，曾国藩写了两篇关于唐鉴的文字，分别为《送唐先生南归序》和《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》。唐鉴对曾国藩影响很大，他对义理之学开始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。

咸丰二年，曾国藩典试江西，其间因母亲病故回家守孝。咸丰三年，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咸丰帝的寄谕，令曾国藩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。接到谕旨后，曾国藩力陈不能出山办理团练，后来，在郭嵩焘的多次劝诫之下，才勉强同意。在担任湖南团练大臣之后，曾国藩在长沙设立了审案局，招募勇丁，揭开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。

在曾国藩担任湖南团练大臣之后，张亮基调往武昌署湖广总督。不久之后，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，曾国藩的处境十分艰难，于是给朝廷上了《移住衡州折》。曾国藩愤怒出走衡阳后，开始一心一意训练湘军。咸丰三年十月，太平天国西征军围攻武昌，清廷谕令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，驰赴长江下游会剿。曾国藩借此机会向清廷申请筹备炮船，在衡阳、湘潭所设的两个船厂自造。经过半年的努力，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。湘军的创建，为曾国藩日后的辉煌事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咸丰三年，太平军攻克南京，斩杀两江总督陆建瀛。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，分别派出军队进行北伐和西征。太平天国西征军于咸丰三年十

二月攻克庐州，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。次年一月，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廷军队，湖广总督吴文翰在战役中丧生。随后，西征军攻克武昌，进入湖南，迅速攻占岳州、宁乡、湘阴等地，直接威逼长沙。

咸丰四年二月，曾国藩率领水陆两师，从衡阳启程，着手准备东征。曾国藩占领岳州之后，对太平军的轻视，致使其受挫后被迫退回长沙。在靖港之战大败之后，曾国藩感到奇耻大辱，试图投湘江自尽，被幕僚章寿麟救出。就在曾国藩灰心丧气之际，部下塔齐布取得湘潭大捷，打败林绍璋的太平军，湘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，把曾国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经过靖港之败和湘潭大捷之后，曾国藩取得了许多经验教训，开始对湘军进行大规模的整顿。经过整顿后，咸丰四年五月，曾国藩从长沙出征，连克常德、澧州、岳州。在平定湖北之后，曾国藩辞谢了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，一心带领湘军东下，并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，大有一鼓作气攻克南京的气势。

然而，九江战役再次兵败，重演靖港之败的一幕，曾国藩又一次跳江，恰逢水师统领彭玉麟驾驶舢板路过而救起。九江战役之败，破坏了曾国藩直接攻克南京的计划，很长时间之内被迫坐困江西。九江战役之败后的一两年时间内，曾国藩没有取得任何战功，并与江西官员结怨极深。当时江西巡抚陈启迈，更多地考虑江西地方利益，与曾国藩产生了很大矛盾，致使曾国藩的处境相当尴尬。正如王定安所说：“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，外逼石达开、韦昌辉诸剧寇，内与地方官相抵牾，其艰危窘辱，殆非人所堪。”^① 曾国藩当时也说：“余前在江西，所以郁郁不得意者：第一不能干预民事，有剥民之权，无泽民之位，满腹诚心无处施展；第二不能接见官员，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，语言有察；第三不能联络绅士，凡绅士与我营款悒，则或因醋而获咎。坐是数者，方寸郁郁，无以自伸。”^②

咸丰六年，曾国藩奔父丧在家，待了整整将近两年的时间，基本上为朝廷所遗忘。咸丰八年六月，曾国藩重新受到朝廷的起用，统令分散在各地的各路湘军的散兵游勇。八月，太平军在陈玉成、李秀成的率领下，对江北大营进行集中攻击，削弱了在安徽的清军势力。因此，曾国藩把攻下

① 王定安：《湘军记》，岳麓书社1983年版，第57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·家书》（一），岳麓书社1985年版，第360页。

安庆作为首要目标，然太平军在三河镇大败湘军，湘军将领李续宾、曾国华丧生。

三河镇大败之后，湘军士气低迷。此时，曾国荃在湖南招募了一支湘勇，前往支援曾国藩。咸丰九年十月，曾国藩制订计划，准备分兵四路围攻南京。与此同时，清军江南大营因遭到太平军的强烈攻势而惨败，两江总督何桂清败逃。于是，朝廷谕旨命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。咸丰十一年，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下安庆，从此湘军名声大震。

在夺取安庆之后，经营江浙便成了曾国藩的重要工作，由此出现了左宗棠、李鸿章两位显赫人物。

咸丰十年，到曾国藩幕府不久的左宗棠就得到曾国藩的举荐，朝廷谕旨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，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。安庆大捷之后，曾国藩上奏朝廷，要求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，全省所有主、客各军，均归其节制。在左宗棠的楚军攻占杭州后不久，朝廷命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，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职务，成为清廷大员，与曾国藩处于同等地位。

咸丰十年，曾国藩派李鸿章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。次年，淮扬水师建成，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水师总督。之后李鸿章在安徽组建淮军。从此，湘军、楚军、淮军三足鼎立，从三面威胁南京，成为后来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力量。曾国藩在安庆大捷之后，攻下南京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目标。同治三年，曾国荃加强了对南京的进攻。在南京即将攻下的情况下，为了不大功独享，曾国藩奏请朝廷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前来合攻，最后终于攻下南京。

同治三年，朝廷命令曾国藩北上剿捻，两江总督职务则暂时交给李鸿章。曾国藩在接到朝廷谕旨后，没有立即听从朝廷命令，而是向朝廷上了两道奏折，即《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缘由折》《请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片》。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，同治四年，曾国藩带领军队北上。曾国藩采取河防之策，根本防范不了迅速发展的捻军，因而主动向朝廷提出辞职。同治五年，朝廷把曾国藩和李鸿章调换了位置，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，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，专办剿匪事宜。

同治六年，曾国藩重新担任两江总督之后，认为制造轮船是救亡图存的一种重要手段，“中国自强之道，或基于此”^①。早在咸丰十一年，曾国

^① 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（十），岳麓书社1993年版，第6092页。

藩就在安庆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军械所，用于生产近代化的武器装备。当时，华衡芳和徐寿同时到达江南制造总局，共同支持曾国藩的洋务事业。同时，曾国藩派容闳去西洋购买制造机器的母机，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把西方先进设备引进国内。除了把制造枪炮的任务交给江南制造总局之外，曾国藩还在局内设立翻译馆，翻译外国书籍，西方近代文化从此进入中国。曾国藩认为，中国要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，徐图自强，仅依靠购买外国机器是不行的，还必须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。

总而言之，为抵抗外国人的入侵，曾国藩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学习从“学作炮弹、学造轮船”入手，发展到购买制造机器的母机，再发展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，最后到派遣留学生出国，开始了对“西学”的引进，正式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。

同治九年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。事件发生后，法国联合各国外交官向清政府抗议，扬言不按照法国要求处理教案，天津将被夷为平地。清廷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，前往天津和崇厚一起处理教案。曾国藩反复思考，认为要想妥善处理天津教案是很难的，但仍然抱着“信守和约”的外交思想去处理这一案件。在处理过程中，曾国藩采取“理势并重”的原则，力求不引发战争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让国人满意，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，除郭嵩焘等少部分人之外，纷纷对其进行谴责，其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在处理天津教案后，曾国藩遵旨重任两江总督，不久病逝于任上。

二 海内外相关研究述评

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外交家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、著名理学大师，同时又是洋务运动的首创者，西方近代文化的积极倡导者。自去世之后，曾国藩一直为学界所关注，尤其是民国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之后，在这两个历史时期，曾国藩文化思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，一度成为学术热点。学者们对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尤其是理学经世思想，以及近代文化思想等方面，都进行了深入研究。

（一）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曾国藩文化思想的研究

就在曾国藩去世后不久的清末时期，王定安、欧阳兆熊等人开始对曾国藩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探讨。王定安在《曾文正祠雅图记》中，明确指出曾国藩的学术渊源来自义理之学。他认为，曾国藩欲融门户销畛疆，力求实事矫空疏，兼崇义理耻穿凿。欧阳兆熊认为，曾国藩文化思想

吸收了诸子百家之长。他指出，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一生三变，其最初钻研翰林辞赋，在师从唐鉴之后，笃信程朱理学，后来又探讨六书之学，博览乾嘉训诂诸书，而不以宋学注经为然。欧阳兆熊认为，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，至出而办理团练事务之后，复而以申韩为用。^①

民国时期尤其是在国家危难之际，形成了一个曾国藩文化思想研究的高潮，学界从曾国藩文化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、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近代文化之间的关系、曾国藩经济文化思想、曾国藩教育文化思想、曾国藩军事文化思想、曾国藩文化思想的整体评价等方面，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
关于曾国藩文化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。钱穆认为，曾国藩文化思想以理学为主，博采百家。他指出，曾国藩能平定太平天国，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，在于其能兼采当时汉学家、古文学家长处，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，其“论学之平正通达，宽宏博实，有清二百余年，固亦少见其匹矣”。^② 钱基博认为，曾国藩生平所得力者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从容挽救危局，使国家转危为安也，持己平实，不为矫激，而欲萃诸子百家之长而当躬。^③ 何貽焜在《〈曾公评传〉叙》中，较为全面地指出了曾国藩与诸子百家之关系。何貽焜认为，曾国藩博取百家之长，树德上追寻孔周，自苦仿效禹墨，持法窃用申韩，善处功名之际，则又取于黄老之术。他说：“故公之大者本于《礼经》，于诸子百家之术，亦取其长而不溯其偏。其于宋大儒之学，笃宗程朱，而于象山、姚江，亦不附和世儒，轻事非诋。故其道大而能容，通而不迂，此公所以能定当时之难，为近代英贤之宗，赫然与葛陆范马诸人争烈也。”^④

关于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近代文化关系的研究。郭斌稣认为，曾国藩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，又学习西方近代文化。他指出，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，曾国藩之荣耀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之荣耀，从曾国藩的人格修养上，可以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。他认为，曾国藩才德兼备、文武兼备，有宗教家的信仰而无其迷妄，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，有艺术家之风采而无其浮华，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，

① 欧阳兆熊：《水窗春呓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17页。

② 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591页。

③ 钱基博：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，岳麓书社2010年版，第29页。

④ 《李肖聃集》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，第204页。

有科学家之条例而无其支离，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，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，是中国传统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造就的最良成果。他说：“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，造诣偏至者固其多，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，可与文正相比者，实不数数觐。”^①同时，郭斌稣认为，曾国藩并不排斥西方近代文化，如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，创设机器局，江南制造局内翻译西方著作，等等。

蒋廷黻分析了曾国藩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与西方近代文化观。他指出，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，孔孟程朱的忠实信徒，甚至是理想主义人物，是实践主义的理学家。同时，蒋廷黻认为，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政治的改革必须有精神的改革，而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，也是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之所在。他将曾国藩事业分为两部分：一是革新，即接受西方近代文化；二是守旧，即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德，认为“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，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，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”^②。

萧一山赞扬曾国藩能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意蕴，以礼学经世为依归，其人格修养、道德境界有着特殊的造诣，绝不是一般汉学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所能比拟的。他认为曾国藩既坚守中国传统文化，又吸收西方近代文化。他认为，曾国藩的救国方案，是分作两方面进行的，一方面守旧，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，以“公”“诚”的精神来改造旧社会；另一方面革新，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方近代文化，以“炮”“船”的机械科学来开创新事业。他说：“革新守旧同时进行，这是经世学的必然道理，也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。”^③

关于曾国藩政治文化思想研究。李朴生认为，曾国藩在事业上最受人称赞的地方，就是知人善任，并对曾国藩的人才观及用人方法进行了系统介绍。^④林炳康认为，曾国藩把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归之于吏治腐败，把惩治吏治腐败视为挽救清王朝的重要手段，对后世整饬吏治有一定参考价值。^⑤

① 郭斌稣：《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》，《大公报》1932年11月7日。

② 蒋廷黻：《中国近代史大纲》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2页。

③ 萧一山：《曾国藩传》，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42页。

④ 李朴生：《曾国藩的用人方法》，《行政效率》1934年第7期。

⑤ 林炳康：《曾国藩论国难与吏治》，《行政效率》第3卷第2期，1935年。

关于曾国藩经济文化思想研究。唐庆增认为，曾国藩的经济思想包括消耗、重农、盐政、币制、厘金，认为曾国藩经济思想能够注重国计民生，对于解决当时的时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。^① 盐务是当年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，齐宣着重论述了曾国藩在整理盐务上的作用和贡献。^②

关于曾国藩教育文化思想的研究。黎正甫对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，认为曾国藩教育子女的主要内容，可归纳为四个方面，即做人、为学、养生、治家。曾国藩特别注重家庭教育，而又能尽其教育子弟之责，本智育、德育、体育三个方面，治家处世孝友为人之道，以循循善诱引导子弟，着重实际，不落迂腐空谈，其训勉子弟者，都能适合其个性，而非难行难做之事。^③ 曾胜镇对曾国藩教育思想形成的家庭环境、时代背景进行了分析，并对曾国藩的政治教育、军事教育、家庭教育、健康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。^④

关于曾国藩的军事文化思想研究。黄仁荣认为，对曾国藩的选将之道、选兵之法、用兵之方等方面进行了研究，认为曾国藩自练湘军到临终，共二十余年，其治兵的方略，对后世治军有借鉴作用。^⑤

曾国藩的实干精神受到民国学界的肯定。秦骊认为，曾国藩的实干精神反映在事业上，做事切实际，不做则已，做必有成；不避艰难险阻，百折不挠；对上对下、对己对人都是一个“诚”字；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兼顾。^⑥ 乃统认为，虽然曾国藩以文人统兵，但没有当时文人的颓风、武人的弊端，注重实践而不浮夸，以忠诚而挽救时弊，其后尤能吸收科学思想，打开国人以往守旧的思想，成就其伟大的事业。^⑦

民国时期，关于对曾国藩文化思想的整体评价问题，大多数学者对曾国藩文化思想持肯定的态度。但是，王芸生、宋亮等人，对曾国藩文化思想的评价持否定的态度。王芸生认为，曾国藩是中国正统书生的最后一个典型代表，是最后一个卫道者，以中国本位文化效忠满清王朝，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统治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。他认为，曾国藩所捍卫的

① 唐庆增：《曾国藩之经济思想》，《经济学季刊》第5卷第4期，1935年3月。

② 齐宣：《曾国藩对盐务的贡献》，《东亚经济月刊》第1卷第5期，1942年。

③ 黎正甫：《曾国藩的家训》，《公教学校》第28期，1936年。

④ 曾胜镇：《曾国藩的教育思想》，《师大月刊》第28期，1936年7月。

⑤ 黄仁荣：《曾国藩之生平及其治军方略》，《黄埔月刊》第5期，1935年。

⑥ 秦骊：《曾国藩之实干精神及其事业》，《汗血学刊》第2卷第6期，1934年。

⑦ 乃统：《曾国藩的实干精神》，《励志》第4卷第29期，1936年。

名教是孔孟之教，反对的是外夷之绪，湘军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，实际上是文化战争，中国旧文化对接受了一些西方新文化的革命运动的战争，由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，中国本应走现代化的新道路，而曾国藩领导的湘军的胜利，又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一次兴奋，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。^① 宋亮认为，曾国藩并没有澄清海内的大志，只是一个实用主义者，一个热心功名的地主绅士的顽固分子而已，在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应该走现代化的道路，但宋儒神秘化的道统，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。^② 王德亮则对王芸生的观念提出了批评，认为其完全抹杀了历史事实，肆意污蔑曾国藩文化思想。他指出，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，以求中国的进步、中国的富强，完全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。^③

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，这个时期学界对曾国藩文化思想的研究较少，并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。阿英认为，曾国藩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，替帝国主义洗刷罪恶，做帝国主义的代言人，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残酷镇压天津人民的爱国行动，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。^④

（二）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曾国藩文化思想的研究

关于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研究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国藩文化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。秦志勇认为，曾国藩的哲学思想主要源于程朱理学，具有注重实际的特点；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实际的需要，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^⑤ 胡维革等人认为，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，曾国藩将“空疏虚鹜”的程朱理学与“务实求朴”的经世之学有机结合起来，构筑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，并以仁学和理学为纽带，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，重新解释义理、辞章、考据、经济四者之间的关系，再现了传统儒学“内圣外王”的本质精义，从而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^⑥ 黄长义认为，曾国藩服膺程朱理学，全力研习经世之学，成为一位思想驳杂、颇富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家；同时，其经世思想具有“卫道”和“创新”的两重特点，既开中国近代化之端

① 王芸生：《论曾国藩》，《人物杂志》1946年创刊号。

② 宋亮：《曾国藩的新评价》，《建政月刊》第2期。

③ 王德亮：《与王芸生先生论曾国藩》，《中央周刊》1948年第40期。

④ 阿英：《曾国藩的媚外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60年11月5日。

⑤ 秦志勇：《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及理学用世观》，《北方工业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科版）1996年第2期。

⑥ 胡维革、张昭君：《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》，《北方论丛》1996年第1期。

绪，又开启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先河，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文化的变迁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。^①

朱汉民认为，曾国藩调和汉宋之争，把“经济之学”明确作为孔门学说中“四者阙一不可”的独立门类，体现其理学经世的主张，其大力吸取儒学思想中实用理性的养料，主张实事求是，并对儒学的“礼”作了极为独到的发挥，为其理学经世思想找到了理论根据；在曾国藩“无所不窥”的学问追求中，礼学一直是其关注的学术重心，具体包括礼经学、礼仪制度考订、礼学理论等方面，其礼学思想中体现出“兼综汉宋”的学术旨趣，均源于其以礼治人的经世理念。^② 邓亦武认为，“理学经世”是曾国藩思想体系的精髓，而理学经世思想的实质就是求实，曾国藩恰恰不独尊理学，而能够根据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，兼收并蓄中国传统哲学中各学派思想以为己用，同时又能冲破夷夏之防的心理障碍，接受和学习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曾国藩的开放意识。^③ 张昭军认为，曾国藩理学思想，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色：一是以宋学为宗，但不废汉学；二是强化辞章之学为理学服务的学术功能；三是具有极为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；四是以“理”合“礼”，重视阐发理学与礼学之间的关系。^④ 徐雷认为，曾国藩的理学思想，以朱子理学为体，以孟子心学、王夫之气学为用，对汉学、陆王心学、桐城学的吸收均以此为前提，其偏重修身治世，客观上反映了晚清社会变革、学术转型的需要。^⑤ 王兴国认为，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做出了三大贡献：一是大力推崇王夫之，使船山学成为近代学术研究中之“显学”；二是将“实事求是”从考据学命题变成哲学命题；三是明确提出了理学经世派的理学纲领——“经济”之学。^⑥

关于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。李育民认为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，非常重视完人的培养，形成修齐治平、内圣外王的政治伦理哲学，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曾国藩的文化品格，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逻

① 黄长义：《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——曾国藩经世思想简论》，《求索》1996年第3期。

② 朱汉民：《曾国藩的礼学及其经世理念》，《中国哲学史》2007年第1期。

③ 邓亦武：《浅论曾国藩“理学经世”思想》，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》1993年第2期。

④ 张昭军：《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》，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4年第3期。

⑤ 徐雷：《曾国藩理学思想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湖南大学，2010年。

⑥ 王兴国：《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个贡献》，《求索》1996年第2期。